

南宋史學研究

甘肅人民出版社

燕永成 著

南宋史學研究

甘肅人民出版社

燕永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宋史学研究 / 燕永成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226-03331-3

I. 南... II. 燕... III. 史学史 - 研究 - 中国 - 南宋
IV. K092.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470 号

责任编辑: 李树军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南宋史学研究

燕永成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方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313 千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000

ISBN 7-226-03331-3 定价: 28.00 元

序

历史是记事的，事的发生牵连到人时地。古代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政事，故天子的言动必由史官记录，而诸侯之国亦设史官。孔子因鲁国史官之记录修成《春秋》，强调褒贬，严于是非、善恶、邪正、忠奸之辨，记事之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创编年史体。其后左氏依经以作传，详述事实。是经为纲，传为目。到汉武帝时，司马迁修《史记》，起自五帝，终于武帝时代，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创纪传体。迁志在“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极称誉之，有云：“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此言甚善。自东汉至唐初，世有著述，皆用纪传体，以纪一代之史，号为正史。直到唐朝后期，杜佑以为历代典章制度散见各史，不易通知，乃修成《通典》，上自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分类述事，此实袭《史记》的《书》，但也有创新之意。盖自唐初开官修前代史之风，用纪传体，号曰正史，私家难以有所述作，乃多改修编年体，或修典制史，如宋太祖初年监修国史王溥纂修《唐会要》及《五代会要》，宋代的各朝会要虽皆官修，但到南宋宁宗时，徐天麟修成《西汉会要》，至理宗初年又成《东汉会要》，两汉典制，尽在于斯。至于编年史书之纂修，宋代史家之贡献最为宏伟。自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后，编年体史书极受史家重视。至南宋孝宗时代，或承其义例而修续编，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或稍变其义例，而效《春秋》与《左传》之书法，大书者为纲，如同《春秋》之简严，细书者为目，如同《左传》之详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成书，遂开创了纲目体。更有袁

枢以为历史重在纪大事，任何朝代都有兴有亡，在统治期间亦有治有乱，典章制度是相因的，而兴亡治乱未必相因，但必各有其原由。编年史是逐日记所发生之事，而欲考某一件事之始末，则有“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之憾，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这是编年史美中不足之处，枢乃以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为核心，依时代顺序标出事目，用《通鉴》记载之原文，编年系日，由始至终，本末灿然明白，给读史者极大的方便，如两汉之间，只用《王莽篡汉》和《光武中兴》两个事目，便可述明一亡一兴、一逆一正，遂创纪事本末体。自此以后，前述两种新史体，又不断有后起的史学家所继承，遂开创史学的新纪元。

宋代史学为何特别兴盛呢？此乃肇端于太祖所确定的重文轻武之国策。太祖不愿步前面五代的后尘，亟欲政治清平，必先强调以仁义治天下，方可一新天下之人的耳目，乃重用读书人治国理民，并立下“不杀士大夫”之誓约，而士大夫亦倡导学问为经世济民之本，不仅自己勤读经史，也劝帝王多接近儒者，广求治道。是以宋朝政治开明，文纲不密，士大夫多以朝野见闻，述之于口，或著录成书，积之日久，遂成时代的风尚，所以宋人所撰的杂史、笔记最多，存于今日者亦不下三百种。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参用了一百多种私家杂史随笔和文武大臣之家传、行状等，皆极详备。南宋史学家所修成的本朝史极富，多半用编年体。但如要改编前代史，亦承用纪传体，其目的不是要取代旧史，而是要纠正旧史对正统朝代认定的偏失。盖因南宋立国江左，仅能守住半壁山河，如同东晋，不免担心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史学家在修前代史时，乃特别强调对正统的认定要从严。如朱熹所言：“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未得正统，自太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太宗并太原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宋开国已二十年了。因此，朱熹特强调：“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起意成书。”司

马光是北宋人,宋太祖之受周禅即帝位,与曹丕、司马炎颇相类。而南宋高宗是承继徽、钦二帝的,时代完全不同,朱熹为南宋立言,在其所修之《资治通鉴纲目》中,以昭烈帝章武元年(221)接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认定昭烈之蜀汉是与高祖之前汉、光武之后汉一系相承的,故贬魏、吴为伪国。此一新见解,首先影响到雅好史学的庐陵萧常,为扶纲常、正人伦、讨乱臣、诛贼子,乃改编陈寿的《三国志》为《续后汉书》,立昭烈帝纪及后主二《本纪》,魏吴之君臣皆编入《载记》。稍后元儒郝经亦修成《续后汉书》,元朝后期,东阳张枢亦修成《续后汉书》,以表彰忠节。至明季,徽州谢陞又修成《季汉书》,吴郡吴尚俭也撰《续后汉书》,均以扶持名教为宗旨。此可见南宋史家的正统观,已得到元明史家的认同。又自朱熹辑《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杜大珪辑《名臣碑传琬琰集》,元、明、清之学者相继纂辑此两类书,今存者不下二十余种。近七八百年来史学的发展,可以说全受南宋史学的影响。

南宋史学承继北宋,且发扬光大之,是为值得研究的。德毅近四十多年来,从事宋代史学之研究,发表专题论文已达三十多篇,尚未汇辑成专书出版。往年拜读到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所著的《宋代史学思想史》,专以著名史学家及理学家之史学思想为主,已属难得。近两年,始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年轻学者燕永成博士,专研南宋史学,曾互通书信,赠送论文和专著,已知其是一位虚心好学的青年朋友。今年夏,乘前往上海师大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之便,得以相见,其待人甚热忱,相谈甚欢。蒙其相告,已撰成《南宋史学研究》一书,诚恳相托为撰一序文,愚思之再三,不便婉拒。月前,收到其二校稿,约三十万言,愚立即细心拜读。此书除《绪论》及《结论》外,中分六章,首述鲜明的时代特色,以修当代史,地方志及军事史为重点。次论史书体裁的创新,史书的多样化,官修和私修的相互配合,史部目录学的功用。其三及于史学思想,就其会通史观,正统论,夷夏说,义理观念及史学批评,逐一分析。其四称述庞大的治史团队,有家族,有地区,或精于考证,或长于说理,或优于文学,各展所

长。其五则是对个案加以分析,对同一史事因记述者非一人而观点有异,各种史籍的纂修都负有其特殊的功用。最后讨论到南宋史学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先就北、南宋对前代史及当代史之编修作一比较,再论南宋史家在史书编修方面的贡献和影响,而史学思想影响后世最大。综而论之,此书体大思精,一位青年学者能有如此功力,已属难得。深望持续努力,以待将来更撰成博大精深的新著作,以贡献于宋史学。治史诚不易,史学、史识皆是非一日之积的,古人称经学家皓首穷经,由本书所述南宋史家来看,无不皓首穷史,此正是吾辈研究史学的人所共同勉励的。特略述宋代史学家之贡献,并书所感怀者以为序,敬请海内外方家有以教正之。

丙戌年冬十一月晦日
丰县王德毅序于台北寓庐

目 录

绪 论	(1)
一、两宋史学的基本概况	(1)
二、南宋史学得以繁荣的社会基础	(4)
三、南宋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7)
第一章 鲜明的时代特色	(19)
第一节 盛极一时的当代史编修	(19)
一、南宋时期的官修北宋后四朝史与私修北宋 史的成书	(19)
二、南宋前期的高宗中兴史编修	(21)
三、南宋后期的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史 编修	(23)
四、南宋灭亡前后的理宗、度宗和瀛国公三朝史 编修	(24)
第二节 区域史学与方志的编修	(31)
一、区域史学	(31)
二、南宋方志的编修	(57)
第三节 南宋军事史著述的编修	(66)
一、备言地理形势	(67)
二、从名将传到战功录、守城录	(70)
三、详明兵制战备	(74)
第二章 多样的编修形式	(85)
第一节 史书成书的多样化	(85)

一、明源求实、分类编目和考论结合的编修形式	(85)
二、一源多流、官私史籍的凭藉互用以及私著凭 依私材的成书方式	(94)
三、史书成书中的改动、抽毁以及摘抄伪托现象	(104)
第二节 史书体裁的发展与创新	(112)
一、崇尚编年	(112)
二、新体裁的产生及运用	(114)
三、编年史体的变通	(128)
第三节 史书编修领域的扩大	(141)
一、书目中所反映的史学变化	(141)
二、会通古今的通史编修	(143)
三、权臣禁私史对史书编修的影响	(148)
第三章 丰富的史学思想	(159)
第一节 会通思想	(159)
第二节 华夷之辨与南宋人的忠节观	(164)
一、正统论	(164)
二、阐发《春秋》攘夷思想	(169)
三、当代史中体现的华夷之辨思想	(173)
四、南宋人的忠节观	(176)
第三节 崇尚义理的史学观	(179)
第四节 南宋治史者的历史观和史学批评	(184)
一、南宋治史者的历史观	(184)
二、南宋治史者的史学批评	(189)
第四章 庞大的治史队伍	(198)
第一节 南宋治史者的多重身份	(198)
一、讲求实证的史学家治史	(198)
二、注重说理的理学家治史	(202)
三、偏爱文辞的文学家治史	(206)
第二节 数量众多的史家队伍	(210)

一、变动频繁的史官队伍	(211)
二、来源多样的史家队伍	(221)
三、南宋史家的身份变动	(224)
第三节 南宋治史者的群体化特性	(226)
一、形式多样的史家群	(226)
二、自辟僚属的史官群	(230)
第五章 个案分析:以史书纪事与史籍功用为例	(240)
第一节 对相同史事论述时的各自特色:以《中兴 小历》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比较分析为例	(240)
第二节 南宋史籍的现实功用	(247)
一、宣扬帝王德政的宝训和圣政	(247)
二、常备检用的会要和玉牒	(251)
三、注重言行讲说的言行录与讲义	(258)
第六章 南宋史学的独特地位及深远影响	(269)
第一节 南宋史学在两宋史学中的地位	(269)
一、两宋在前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269)
二、两宋在当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308)
第二节 南宋史学在整个史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317)
一、在历史编撰方面的地位及影响	(317)
二、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	(325)
结 语	(333)
附录:南宋主要治史者史著著录存佚目录	(337)
主要参考文献	(360)

绪 论

宋代史学承袭隋、唐时的修史制度以及中唐以后的治史之风,使得官、私史学的发展均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并且它还对此后元、明、清时期的史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明确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

一、两宋史学的基本概况

南宋既直接因袭了北宋时期的修史体制及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又因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南、北宋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处于相对统一背景下的北宋王朝而言,官方修史占主导地位。其间,朝廷出于以史为鉴的现实目的,既组织编修了唐五代十国方面的史书,又系统地编修了本朝国史。尤其是在对本朝史的整理编修方面,北宋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以及玉牒所等为常设分支机构的修史体制,从而使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以及国史能得以及时编修。在修纂程序上,则形成了修日历则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修实录则依据日历,修国史则依据实录的编修程序。用图表示即为:

起居注
时政记 } → 日历 → 实录 → 国史

在史籍编修的具体体例方面,见于史载的就有《修日历式》和《修史例》。^[2]同样,会要、圣政和宝训等官方史籍的整理编修亦逐渐形成了制度。由于有如此完备的修史体制,从而使得北宋官修史籍极盛一时。该修史体制为南宋时期所承袭。此外,图经、方志以及年

谱等的编修,同样扩大到了南宋。

同时,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对宋代影响极大。中唐时期,随着社会的剧烈震动,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一则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人士,在探求《春秋》经义之时,考《春秋》三传,并论其短长,从而开疑古辨伪之风。他们同时极力倡导《春秋》的宗旨在于“尊王”。受其影响,北宋孙复、孙觉等人积极倡导《春秋》“尊王”旨意,欧阳修等人遵从《春秋》褒贬笔法,刘敞、欧阳修等鼓吹疑古辨伪之风,从而使《春秋》学大盛。其间如尹洙撰《五代春秋》,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以及他奉诏与宋祁等修《新唐书》,其主旨均在于取法《春秋》遗意,阐发“尊王”思想。此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3]二则是与唐前期以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为主体的状况不同,中唐以后,私家在质疑检讨官方设官修史弊端的时候,纷纷求变,从而使得编撰编年体史书以及通史日渐兴盛。到北宋时,《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便是此风影响下的产物。最后,中唐注重探求典制沿革之风,亦直接对两宋有影响。自唐刘秩撰有《政典》35卷、杜佑撰有《通典》200卷,并由此开创了典制体之后,北宋仿效之作有宋白的《续通典》200卷,南宋则有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魏了翁的《国朝通典》200卷,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等。

对于处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而言,深受亡国之痛和常处强敌威胁之下的南宋君民,既要深刻反思和总结北宋亡国之因,又要从历史上全面探求中兴之道,维护现有政权。因此,官、私方史书的编修乃至史学的发展均极为兴盛。其一,与北宋相比,南宋官、私方更为注重对当代史的整理编修。其中南宋重修、编修乃至续修官方史籍如日历、实录、国史、会要、圣政和宝训等所取得的成就,已大大超越了北宋。方志和年谱等的修纂,亦比北宋时更盛。同时,私家编修当代史则更为突出。如李焘、王称、徐梦莘、李心传和马端临等人甚至家族专门从事着当代史学研究,四川区域亦以编修当代史著著称当

时。其二、南宋时人颇为注重对古今历史变化之理的探求,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对此,时人称颂说:“法祖嘉猷,国家崇尚史学,国朝文明开运。学校养才,群经诸史,朝吟暮诵。至于明习国典,通达世务,则于史学尤重焉。……至庆元间,经学固盛,史学亦崇。不事浮虚,惟取练达。学有体用,非崇体而废用也。”^[4]当时如浙东学派以注重探求古今制度沿革变化而著称于时;福建朱子闽学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湘湖学派偏重对《春秋》学的研究,以及江西史家讲求历史文献的补辑、整理与考证。最后,南宋治史者在史书体裁方面多有创新和发展。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均在此时得以产生,长编体和纲要体等编年体的变通形式亦出现于此时。此外,南宋亦是方志的定型期。正因为如此,南宋崇尚编年、倡导会通、讲求正统以及推崇义理之风甚盛,具有史官身份者以及私家治史者人数众多,史著数量极为繁富。据笔者对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治史者及其著述加以统计可知;南宋有史著的治史者不下 250 余人,南宋史著的数量在 400 多种。

对于南宋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地位,史学家蒙文通明确指出:“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言之者于此未尽同也。”为此,他具体指出:“余谓南渡之究史者众矣,而实以三派六家为最卓。其与北宋异者,自欧阳、司马之传论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诸家则治人与治法兼包,义理与事功并举。”^[5]其中蒙先生所推崇的“三派”是指性理派、经制派及事功派史学,“六家”为陈亮、王自中、唐仲友、陈傅良、吕祖谦和叶适。即就是指注重制度沿革研究的浙东学派。台湾的王德毅先生更进而指出:“就北宋南宋而言,南宋史学特别重要,史家贡献亦独多,近八百年的史学发达,都是由南宋领导着。”^[6]蒙、王二先生之论无不表明;南宋史学本身地位突出,甚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及影响。

二、南宋史学得以繁荣的社会基础

1127年金灭北宋,宋徽宗和钦宗父子被虏北迁。此后延续北宋基业的南宋王朝,领土面积大约减少了1/3,但依然先后受到强邻金和蒙古(元)的长期威胁与打击,并且逼迫与金和蒙古(元)签订了一个个屈辱和约。其中南宋与金的三次议和(绍兴、隆兴和嘉定时)均需输纳岁币。据统计,南宋向金输纳岁币67年,计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文。^[7]这种状况正如史书所载:“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8]这种屈辱悲愤的亡国史与长期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南宋君民不得不时时关注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力搜集有关史料,通过编撰北宋史以表达对亡国的深深怀念之情。如熊克、徐度、李焘、王称和徐梦莘等人无不如此。同时,在对外和、战及内部朝政问题上,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四大权相往往采取植党排异、控制台谏,以及蒙蔽君主等专制手段加以独揽朝政。南宋民众在极力痛陈时弊,甚至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他们往往在抗击金、蒙古(元)的对外战争中,或直接投身战斗,或直言应敌救弊之策,从而体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对于此间涌现出的诸如德安、襄阳等著名守城防御战例,一些有为之士便及时加以总结,并编成了诸如战功录、守城录之类的史著。对于在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著名将领,时人则往往编有名将传等等。此外,时人还对古今兵制及战略战备等加以总结,其最终目的均是为现实需要服务。

南宋社会的处境虽则如此,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宋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南宋人民为扩大土地面积,有些地方甚至垦山为田,围湖造田。在东南发达地区,人们还普遍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以便提高单位产量。象两浙的上田,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产谷达到了五、六石。因此当地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制瓷、造船等颇具规模,造纸业和印刷业相当发达。如平江府彩笺、蜀笺、温州蠲纸、

歙州表纸、杭州藤纸、绍兴府竹纸及宣州宣纸等,均在当时颇为出名。临安、成都、眉山、福建及江西吉州等地成了全国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并且临安、成都和眉山等地书铺林立,书商活跃。同时,随着南宋市镇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会子的大量通行,使南宋工商业经济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此外,榷场贸易和海外贸易亦相当发达,丝织品、茶叶、瓷器和书籍等被出口到了大理、高丽和日本等地。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内容的空前丰富,不仅为有识之士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及其思路,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如谢谔字昌国,临江军人。为文仿欧阳修、曾巩,他不仅撰有《孝史》50卷,而且南宋初“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上进朝廷。朝廷“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9]又如董煟字季兴,自号南隐,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撰《救荒活民书》3卷。据其《自序》所言:该书“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则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以备缓急观览”。该书完成后上进朝廷,并受到宁宗的褒奖。明人李贤评论说:“予观董氏所集《救荒活民书》,其用心仁矣哉!凡为君为臣者不可无此书,而为守为令者舍是无所用其心矣!”^[10]清四库馆臣更认为该书属“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11]类似的再如会稽人丁锐撰的《仁政活民书》2卷和《明刑尽心录》2卷,以及诸葛兴撰的《先贤施仁济世录》1卷等。其他以各种不同形式与体裁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专门性史著还有不少。以上情况足以说明,南宋史家已不再局限于对帝王将相史的撰述,而是已将记述的范围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教育文化领域,随着南宋初北方人才的大批南迁,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南宋在该方面也已取得了极大成就。南宋中央设置有太学、武学和宗学,地方州县学亦相当普及。此正如叶适所言:“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12]同时,随着南宋各学派讲学风气的兴起,南宋书院大兴,先后兴起的书院总数达400多所。著名的如朱熹修复的白鹿洞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陆九渊修建的象山书院和吕祖

谦讲学的丽泽书院等。此外,乡塾村校亦极为普及。如私学发达的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和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3]如此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为南宋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叶适对此指出:“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14]此外,伴随着科举考试的进行,利于科举考试的相关书籍被大量编辑出版并广泛流行。如《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15]吕中撰写的《大事记讲义》,亦为“场屋中用之”。这无疑对南宋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思想学术领域,南宋逐渐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流派,以陆九渊创立的心学派别,浙东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与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胡安国、张栻为代表的湘湖学派,以及以谯定、魏了翁为代表的蜀学流派等。这些流派在探求宇宙间天人关系和拯救时弊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看法。对此,南宋末周密指出:“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16]周密在此指明了南宋时的主要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在阐扬其理论体系或表明拯救时弊之策时,往往能借助于史学。如朱熹一派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浙东学派注重对古今制度沿革的研究;湘湖学派偏重讲求《春秋》之学,以及蜀学流派中一些人关注当代史学的研究等,这种状况则必然为南宋史学的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哲学基础。

总之,南宋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南宋时期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无疑为南宋史学的发展昌盛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南宋史学之所以繁荣,并不是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三、南宋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南宋史学的研究,往往同整个宋代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从现今对于南宋史学的研究状况来看,不仅有专门论述南宋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一些通论整个宋代史学的论著。对于通论性论著,因其常常会论及南宋时期史学的发展情况,我们在此亦有必要提及。目前在有关《中国史学史》类论著中,编修者在论述到“宋代史学”问题时,往往都加以详细论述,并给予极高评价。而其间在论述到南宋史学时,颇具特色者当推史学家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第三章“中唐两宋”有关部分(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蒙先生在有关南宋史学立目中,就有“南渡女娄史学之源流与三派”、“义理派史学”、“经制派史学”、“事功派史学”、“金华文献之传”(原缺)、“西蜀、江西之史学”(原缺)以及“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原缺),可见他对南宋史学的发展流变有自己的看法。

再以具体关涉到南宋史学的论著而言:

1. 从总的方面讨论宋代史学地位和作用的论文主要有:高国抗的《宋代史学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宋衍申的《宋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松辽学刊》2/1984)、台湾王德毅的《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见《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主编))和《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王天顺的《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会刊),以及罗炳良的《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2003)等。其中高国抗先生认为宋代史学达到了古代史学的高峰。宋衍申先生认为宋代史学集以往史学之大成,又为后代史学所不及。王德毅先生则通过对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等多方面问题的考察,指出南宋史学特别